

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由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发展。城市发展模式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进入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随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居民住房需求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落实“人民城市”理念,对居住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居住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生活载体,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城市的真谛是“空间正义”“治理赋能”“利益共享”,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让住区成为社会和谐的“粘合剂”,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大城市居住空间既要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服务资源,也要促进资源的均衡配置与共享,缓解因居住分异带来的社会影响。当前亟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缩小居住差距,推动城市居住空间向社会包容、环境宜居、治理协同的方向发展,为构建包容多元的现代城市提供支撑。

从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仍将长期存在。这一现象

以融合思维构建和谐居住空间的时代探索

■ 陈燕

是去单位化、社会阶层分化、住房市场化、制度变迁以及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等多重动力共同塑造的社会空间结果,导致城市居住结构日趋复杂。促进居住融合因而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议题,提升空间治理的人民价值,推动都市区增长向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这些都亟待从规划引导、治理创新与政策响应等多维度予以回应。

和谐的城市居住空间应具备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总体空间结构相融合、并与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相匹配的特征,其核心是构建功能完善、宜居宜业的高质量空间布局。新时代背景下,这一构建过程须深入贯彻“人民城市”理念,响应国家城市工作部署与住房制度改革要求,着力抑制居住分异、促进空间正义。在路径上,需兼顾物质环境与社会文化双重维度,一方面提供可负担、绿色适老化的硬件支撑;另一方面培育社区认同与多元融合的社会生态。

最终通过多维度协同,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构建和谐的城市居住空间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路径创新:

第一,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优化空间治理与规划。新时代城市住区规划应回归其空间资源配置的公共性本质,将维护公平与协调作为核心职能。规划工作者须坚守专业伦理,切实承担起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责任,通过规划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效引导和规范市场机制,促进土地及空间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公平分配。其中,提升公共空间的人民性与可及性,使其真正融入市民日常是当前关键。保障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平等享有发展权益、避免其被边缘化,已成为城市公共政策与空间治理的核心任务。

第二,构建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创新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住房价格问题牵动社会神经,其调控不能依赖短期手段,而应遵循经济规律,系

统把握供需两侧的多重影响因素并进行动态优化。政府需深化制度改革,强化空间规划的引导与约束作用,遏制房地产开发中的短视行为,推动行业向可持续模式转型。当前重点在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积极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稳妥推进城中村改造与危旧住房更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应将房地产转型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不仅能有效改善人居环境,更是推动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升级的关键路径。

第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构建包容、健康、和谐的居住空间。其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追求社会整体福祉的最大化。面对当前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必须从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出发,推动社区层面的有效整合与社会融合,培育包括新老市民在内的新型社区认同与良性互动关系。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为引领,积极

探索通过混合居住模式、公共服务融合以及数字赋能等路径,并配套优化土地供应、推行配建融合政策、完善设施共享机制等实质性举措,切实缓解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最终推动社会公平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第四,多维度协同发力,健全长效保障性住房体系。构建可持续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是改善民生福祉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耍基础。当前住房保障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矛盾:保障房供给总量与城市实际需求不匹配,建设进度滞后于城镇化发展需要;社区公共服务配套水平与居民期待存在差距;现有政策对“夹心层”群体的住房权益覆盖不足;住房保障金融支持机制尚不健全,且缺乏有效的动态监管与有序退出机制。面对这些结构性困境,亟待从扩大有效供给、完善制度设计、提升治理效能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构建规模适配、结构优化、运行有序的长效机制,切实发挥其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基金项目:2025年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重点工作课题“深化文明乡风建设工程”研究成果。
 (作者系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博士、研究员,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专家)

文化传播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三重路径

■ 黄兰花¹ 冷雅琴²

新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国的深度理解与价值认同、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探索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不仅能够为跨文化交流搭建更通畅的桥梁,更成为推动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以增强文化吸引力为核心,挖掘中华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蕴含深刻的哲理道理,为构建中国故事提供丰富素材。增强故事吸引力的核心在于深入挖掘并展示故事素材的文化内涵。一方面,要进一步打破“符号化”浅层表达,构建“哲理+情感+审美”三位一体的叙事体系。这需要我们系统性地梳理并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从中提炼出蕴含普遍价值与时代精神的文化精髓,结合现代语境进行创作,再通过文学、影视、游戏等载体转化为具象故事。例如,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精神,与当代青年对个体价值的追求结合,既保留了传统神话的魂,又赋予其时代生命力,最终火爆出圈。另一方面,要以“跨文化共情”为桥梁,寻找中华文化与全球价值的共鸣点。文化吸引力的本质是“价值认同”,而非简单的符号堆砌或形式模仿。当一种文化能够跨越语言、地域与文明的差异,触达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理性诉求时,它便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力。

二、以强化文化传播力为驱动,创新讲述与传播方式

好的传播手段和策略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保障。首先要构建多元化传播主体体系,把“自己讲”与“别人讲”结合起来。不仅政府机构、主流媒体要发挥主导作用,更要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知名人士以及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形成“大宣广”格局,还要借助国际友人、海外华人华侨、外国媒体及意见领袖的力量,通过他们的视角来传递中国主张和平发展的理念,打破西方舆论对中国固有的偏见和误解。例如,今年1月,美国TikTok用户涌入小红书,用户通过分享中国生活视频,引来广泛关注,其中“中国高铁速度”“移动支付便利性”等话题播放量超50亿次,打破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由此,可以邀请国外友人实地探访中国,亲身体验中国的风土人情、发展变化,鼓励他们成为中国的“民间大使”,用真情实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其次,要发挥新兴媒体作用。不仅要巩固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核心地位,更要激活非主流媒体的独特优势,形成互补共进的传播格局。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兴平台,以更加鲜活、亲近的姿态,将中国文化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2025年课题招标“文化自信视阈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析”(项目编号:ki202507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1.中共共青城市委党校;2.中共九江市柴桑区委党校)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 王若涵¹ 段文健²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和鲜明底色,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始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新时代新征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任务更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问题更加突出,唯有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斗争实践,才能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动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篇章。

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汲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伟力

作为矛盾双方基于各自价值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是解决突出矛盾的必要方式,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发扬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消除各种安全隐患、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精神武器。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些精神谱系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树立了精神丰碑。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面对更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这就需要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重大原则,在斗争中传承和赓续精神血脉,汲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展现出百年大党应对未来重重大险阻的意志,以强烈的勇气和胆气克服一切困难和挑战,积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保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

斗争,考验的就是战略。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要科学谋划战略定位,时刻保持战略定力,高度警惕风险挑战,在准确把握世情、国情的新变化中保持应对主动,以大无畏的气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解决重大矛盾。在百余年斗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清醒的战略认知、科学的战略方法、灵活的战略实施,带领中国人民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现了党在错综复杂局面前强大的战略定力。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面临战略机遇,又面临风险挑战,这就需要保持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在敢于斗争中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在善于斗争中谋定后动、应势而变,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毅力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迎击现代化进程中的惊涛骇浪。

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激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动力

斗争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勇于直面革命、改革、发展中的一切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历史自觉性和主动

(作者单位:1.成都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信息化时代《共产党宣言》传播的鲜明特征

■ 杨梦晴

一、载体革新:从纸墨传薪到数媒共振

《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载体在信息化时代发生了颠覆性变革,完成了从“纸墨传薪”到“数媒共振”的跨越。1848年《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首次以单行本出版时,仅靠手工分发与小范围传阅;即便到20世纪,其传播仍主要依赖图书馆借阅和课堂讲授等有限方式,覆盖范围和效率长期受限。

信息化技术彻底打破了这一桎梏,构建起“文本+视听+交互”的多元数字载体矩阵。在文字端,《共产党宣言》原文及解读被转化为可检索的电子文本,通过学习强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平台实现毫秒级传播,读者可随时查阅原文、注释及权威解读;在视听端,短视频平台成为传播主阵地——B站UP主用动画演示“两个必然”的历史逻辑,抖音创作者以情景剧还原“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论述场景,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表达;在交互端,数字出版物嵌入思维导图、史料链接和读者批注功能,读者点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句话,即可跳转至工业革命史料视频,实现“阅读—理解—拓展”的闭环。

这种载体革新不仅提升了传播效率,更重塑了接受体验。传统纸本传播依赖读者的文字解读能力,而数字载体通过“视觉化转译”降低了理解门槛——当青年学生在短视频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被转化为流水线工人的生活变迁动画,理论便从抽象概念变成了可感知的生活逻辑。

二、互动深化:从单向灌输到共创共生

信息化时代的传播逻辑,让《共产党宣言》从“单向灌输”的理论宣讲,转变为“共创共生”的互动实践。在传统传播模式中,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是

“中心—边缘”结构:学者、教师、作为“解读者”,通过课堂讲授、报告演讲等方式传递理论,受众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缺乏表达与参与的渠道。在这种模式下,《共产党宣言》的解读权高度集中,容易因解读视角单一而与受众产生隔阂。

而在社交媒体、UGC(用户生成内容)主导的数字时代,传播关系被彻底重构为“网状互动”。受众不再是理论的“容器”,而是成为传播的“参与者”与“创造者”。青年网友用漫画形式绘制《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场景,在小红书收获数万点赞;甚至中学生在模拟联合国活动中,以《共产党宣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理论依据,创作模拟提案——这些自发的创作行为,让理论从“书本里的文字”变成了“生活里的表达”。

互动深化更体现在“对话式传播”的兴起。线上研讨会不再是专家的“独角戏”,而是通过弹幕提问、连麦发言实现即时交流;海外网友在Twitter用当代社会案例解读“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网友参与辩论。这种互动不是对理论权威性的消解,而是通过多元视角的碰撞,让《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更丰富的阐释可能。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的,“当普通劳动者开始用自己的语言解读《共产党宣言》时,这部著作才真正完成了从‘理论纲领’到‘行动指南’的转化。”

三、边界突破:从地域局限到全球共鸣

信息化时代的传播逻辑,让《共产党宣言》的传播突破了地域、语言与文化的边界,实现了从“地域局限”到“全球共鸣”的跨越。在印刷时代,受交通、翻译、政治环境限制,《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

数字技术构建的“无国界传播网络”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在语言层面,AI翻译工具与多语种志愿者协作,让

《共产党宣言》在300多种语言中实现“即时转化”。不仅有英语、法语等主流语种的权威译本,还有非洲语种的本土化解读,甚至针对手语使用者开发了“视觉化译本”。在传播渠道上,海外社交媒体成为重要阵地:YouTube上“简明解读《共产党宣言》”系列视频被翻译成47种语言,累计播放量超5000万人次;Instagram上的“红色插画”账号用视觉符号诠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吸引了来自拉美、东南亚的百万粉丝。更具突破性的是“跨文化适配”的传播智慧。不同国家的传播者不再机械套用原文表述,而是结合本土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

这种全球传播不是简单的“理论输出”,而是基于共同关切的“思想对话”。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数字时代的经典传播报告》中指出的:《共产党宣言》在全球的数字传播,证明了真正的思想力量不在于传播范围的广度,而在于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回应能力。

从纸墨到数媒的载体革新,让理论传播更高效;从灌输到共创的互动深化,让理论解读更鲜活;从地域到全球的边界突破,让理论影响更深远。信息化时代的《共产党宣言》传播,本质上是一部经典在数字文明中的“生命力重生”。它没有因技术变革而褪色,反而通过与当代人的对话、与现实问题的结合,持续释放着“改变世界”的思想能量。这种传播特征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当代传播提供了范式,更印证了一个真理:真正的思想永远能在时代变革中找到新的表达,永远能在人类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

基金项目: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研究史”(项目编号:2024SJB0012);2.2024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统一战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内在要求与实践路径”(项目编号:xcxjh20241707)。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情理法融合治理

——“枫桥经验”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 邓志坚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正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包括人口流动加剧、矛盾类型多元化(如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劳资争议等),群众诉求个性化等,面对复杂的治理场景,传统“行政主导”“刚性管控”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在此背景下,发源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历经60余年演进,已从传统乡村治理经验升级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重要范式,而“情理法融合”

作为“枫桥经验”的精髓,则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供了关键思路。

推动情理法融合治理不仅是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更是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将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水平。对此,本文基于“枫桥经验”,分别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希望能够为基层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主体体系

为深化情理法融合治理,需从党建引领以及多元协同两方面构建系统化体系。一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建立“党建+治理”专班,由社区党组织书记牵头,整合街道干部、司法人员和社会组织负责人,定期召开推进会,统筹化解跨部门复杂矛盾。与此同时,选拔“懂法律、善沟通、有威望”的党员担任“治理联络员”,深入网格收集诉求,在调解中兼顾政策法规和邻里情分,实现刚柔并济。另一方面,激活多元参与,形成协同治理格局。其中,政府部门要以“法为基”,推动司法力量下沉,提供法律支持,而相关职能部门则要在政策执行中借助听证会等形式吸纳群众“情理诉求”,优化政策;社会组织要以“理为桥”,培育乡贤调解会、行业协会、心理咨询机构等,依托公序良俗

疏理、情感疏导;而群众则要以“情为核”,利用居民议事会、楼栋群等平台,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与“情理判断”,如小区停车规划兼顾老年人便利(情)、分配公平(理)以及法规要求(法)。借助党建引领和多元协同深度融合,构建情理法统一、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治理新常态。

二、优化“递进衔接”的治理流程

在推进情理法融合治理过程中,应构建“情—理—法”三步递进式矛盾化解机制,实现从源头疏导到刚性保障的全流程闭环治理。第一步,“情”字当头,前置疏导,实行“诉求首接制”,由网格长或社区工作者第一时间接待,利用“拉家常”等方式安抚情绪,挖掘情感诱因。对于邻里口角、家庭琐事等“纯情感类”矛盾,通过走访、调解就地化解;对于复杂矛盾则转入下一环节。

第二步,“理”字为要,多元协商,组织“情理协商会”,邀请当事方、利益相关方和调解员(如乡贤、行业代表)共同参与,基于公序良俗“摆事实、讲道理”,寻求共识。协商结果形成“协商备忘录”并签字确认,增强约束力。第三步,“法”字兜底,刚性保障和柔性衔接,对达成一致的,由法律顾问审核备案合法性,必要时协助签订正式协议;对协商未果的,则引导通过“调解+仲裁+诉讼”依法解决。同时积极推行“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经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力,实现“情理”和“法理”的无缝衔接。这一机制兼顾治理温度和规范性,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路径。

三、打造“数字赋能”的治理工具

为推动情理法融合治理,构建情理法融合治理朝着智能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则应着力构建“情理法融合治理平台”,并推广“智慧网格”治理模式。其中,平台功能需包括:利用AI语义分析自动识别诉求中情感、事理、法理关键词,实现精准分类;按照诉求类型智能匹配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等资源;收录典型案例并标注处理要点,为基层干部提供参考;推动和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数据共享,辅助情感调解与矛盾预判。同时,积极推广“智慧网格”治理,为网格员配备移动治理终端,实时上传信息并调取处置建议;借助大数据动态监测辖区矛盾变化,及时调整治理重点,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通过平台和网格的协同运作,构建数据驱动、精准高效、情理法有机统一的基层治理新生态,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总之,“枫桥经验”视域下的情理法融合治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通过采取上述一系列有效手段,可以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今后,可围绕情理法融合治理的机制设计、绩效评估以及跨区域推广路径展开进一步探讨,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系统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作者单位:中共惠东县委党校)